

百年西泠

百年
秋
印
學

社
名
士
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 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西泠印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
印社编. —杭州: 西泠印社, 2003. 10
(百年西泠)
ISBN 7-80517-664-7

I. 百... II. 西... III. 篆刻—中国—文集
IV. J29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8959 号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封面题字: 朱关田

责任编辑: 张 爽 侯 辉

责任出版: 叶 涵

封面设计: 郦文龙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29.25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17-664-7/J·665

定 价: 98.00 元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编纂出版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任：启 功

主 任：郭仲选

副 主 任：程十发 刘 江 朱关田 韩天衡 陈振濂 王玉明

成 员：吕国璋 高式熊 王佩智 黄镇中 金鉴才 丁茂鲁

余 正 蒋北耿 童衍方 孙慰祖 吴 莹 江 吟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朱关田

副 主 任：陈振濂 金鉴才

编 委：余 正 祝遂之 孙慰祖 黄 惇 李刚田

胡小罕 戴家妙

执行编委：胡小罕 戴家妙

特约编辑：桑建华

责任编辑：张 爽 侯 辉

序

金鉴才

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期间举办了以“百年名社·千秋印学”为主题的国际印学研讨会，从225篇应征论文中经过反复评议后入选的62篇优秀论文在会上作了宣读或交流。一个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不仅在西泠印社的学术史上，而且在当代众多同类学术活动中，也是少有的兴旺景象。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处身于全球化浪潮中，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在商品经济时代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下，在印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普及的形势下，西泠印社在当代国内外学术界，仍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小至于印学这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对于西泠印社、对于印学、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此。

大概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学术团体能像西泠印社这样经受一百年的历史沧桑而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长足发展的。百年西泠，实在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非常卓特的现象，也是中国学术界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对这一现象和这份遗产的研究，是这本论文集一个醒目的亮点。有组织、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开展对西泠印社的研究，实在是晚了一点，日月推迁，人事代谢，档案短缺，给研究者们带来重重困难。但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西泠印社经过多方面的征集考查，终于在百年社庆前夕推出了《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和80万字的《西泠印社百年社史资料长编》，为深入开展对西泠印社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收入这本论文集的，除了6篇社史资料以外，还有18篇研究西泠印社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西泠印社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西泠印社的组织、宗旨、人物、交谊等诸多方面，作为一个专题，也可谓略具规模。特别在对西泠印社早期社长的选任和社员的组织结构方面的研究考察，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却有不少学者选择了这一课题，并作了大量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有价值的见解，这种知难而上、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术胆魄和求索精神，是很可宝贵的。虽然与“百年名社”这一深沉浑厚的历史存在相比，我们

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显得有些单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但这项研究的开始进行，表明了西泠印社对自身价值的充分信心，对历史和未来的庄严责任。100年来，西泠印社的命运和我们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西泠印社的学术精神始终体现着我们伟大民族巨大的包容度和鲜明的独特性，这正是西泠印社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曲折而终于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是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魅力所在。

印之为学且值得“研究”，反映出西泠印社前辈们对印章中诸多文化内涵的体悟。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滋养了印人，然后才是滋养了篆刻，使篆刻摆脱“雕虫小技”的地位，成为独特的文化存在而进入到“道”的境界，完成了由实用物向相对独立的艺术品类的升华。无论元明以来的印学发展史，还是西泠印社的发展史，都雄辩地证明：印学只有将自己的根系伸展到广大的民族文化沃土中汲取养料，才能提升自己的品格与实力，具备更多方面的抗风险能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日用物是容易被替代和淘汰的。印章之不废，是因为它向文学、鉴藏、书画甚至史学、美学、文字学等领域的渗入，从而成为以盘根错节地相互交融为特征的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员，在这个民族文化大家庭里，任何一个成员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不到与它相对的其他文化门类彻底覆灭的那一天，印章和印学就不会消亡。这是中国印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一以贯之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已往的印学研究中，学者们似乎更多的注重于印章的制度、文字、制作、使用、流派、印人、印谱等本体方面的考察，而从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范畴审察和研究印学的努力还显得不够。在选编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发觉部分学者开始将印学研究的视线投向印学与民族文化、印人与文化人等相关领域，这应该是当代印学研究逐步趋向成熟的可喜标志。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是个很大的题目，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企望通过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发行，引起学者们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更多关注，并期待着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

目 录

序	金鉴才	1
西泠印社研究		
西泠印社精神传万年	刘 江	1
西泠印社社长史二考	陈振濂	10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	余 正	18
中国印学博物馆建立始末	林 如	29
论民国初期的乐石社及其与西泠印社之关系	方爱龙	37
历任社长对西泠印社现代转型的贡献	史长虹	47
西泠印社早期赞助人简考	沈 玉	52
早期的西泠印社和近现代美术社团	〔日〕菅野智明	60
吴昌硕和大谷是空	〔日〕松村茂树	64
张宗祥与转折期的西泠印社	徐 清	71
沈曾植吴昌硕交往初考	戴家妙	76
哈少甫生平及其与西泠印社早期活动的关联	张炜羽	81
高时显与丁辅之	卞孝萱	86
张钧衡和早期西泠印社	王巍立	91
河井荃庐论	李中华	93
唐醉石与新浙派	王大中	97
王个簃篆刻艺术简论	丘 石	102
朱复戡的篆刻艺术	王庆忠	107
印学研究		
元明印学述略	祝遂之	112
封泥、印章所见秦汉官印制度的几个问题	孙慰祖	123
玺印的滥觞与起始	徐 畅	131
“印宗秦汉”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	陈大中	145
“晋率善羌中郎将”银印及相关历史之研究	〔日〕久米雅雄	152
宋代内府鉴藏印研究	陈建平	160
中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古代印迹	〔法〕龙乐恒	168
广东印章史述略	梁晓庄	178
桐乡印史稿	沈慧兴	186
民国时期篆刻润例现象浅探	胡志平	193
论西泠八家之印风	林乾良	198

浙派篆刻创作特色谈丛·····	于良子	205
“四凤派开启浙派”驳论·····	方小壮	214
浙派的印学理论与实践·····	盛东涛	228
论明代文人篆刻兴盛的文化背景·····	陈道义	235
吴门篆刻史论·····	周新月	240
论清代文人篆刻流派的历史基点·····	姜寿田	257
论明代后期印学的尚意思想·····	蔡显良	261
元明清印论中的印史观述略·····	薛龙春	265
论周应愿《印说》的仍旧观·····	李彤	269
明代印人方用彬及同时代印人研究·····	黄惇	274
陈秋堂陈曼生及其印艺·····	杨坤炳	286
赵之谦“天道忌盈人贵知足”印款考·····	胡小罕	292
阮元与浙派印人交游考·····	金丹	295
吴让之与包世臣、姚正镛交游考论·····	朱天曙	302
浙派集大成者赵之琛论·····	盛诗澜	309
魏锡曾研究·····	俞丰	314
女性印家研究·····	恭庵	323
从西川春洞的自用印看初世中村兰台与其的交友·····	[日]前田秀雄	330
冒鹤亭的印学情结·····	石剑波	335
吴昌硕的《铁函山馆印存》·····	童衍方	339
《吴孟思印谱》考辨·····	孙向群	345
新见黄士陵残谱考·····	董建	350
葛昌楹辑梓印谱述略·····	葛贤鑽	355
印章艺术的独立标志——边框·····	蔡树农	362
圆朱文印四辨·····	许敏雄	366
印章“朱红美感”与中国古代“青色艺术”·····	罗荣	379
论汉印篆法的弹性美·····	谷松章	382
 社史资料		
编印《吴昌硕自用印集》二三事·····	张耕源	390
缅怀导师沙孟海·····	[日]河内利治	395
湖南湘阴李氏与早期西泠印社·····	李崧峻	401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艺事辑略·····	方国梁 桑建华	406
王福庵年表·····	袁慧敏	437
童大年先生年表·····	童启熊 童启庆 林乾良	445
来稿存目表·····		452

西泠印社精神传万年

——纪念西泠印社创立百年

刘 江

西泠印社自1904年创立以来，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回顾过去的开创与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不断与困难、挫折斗争，终至发展、壮大，成为“天下第一名社”的历程，我觉得西泠印社这个群体，有一股坚韧的意志，强劲的力量，统帅与支持着这个民间学术团体。思索再三，归纳总结，逐渐清晰：这是西泠印社群体的思想、意志、毅力的结果，可名之曰：西泠印社精神。不知确否，尚望同道教正。

西泠印社精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见之：

一 独立的创新精神

任何艺术，若要发展，都要创新。同样任何艺术的活动或艺术企事业的发展，也要有创新，否则就不能发展，就要消亡。西泠印社的独立创新精神体现在哪些事情上，哪些工作中？

（一）群体意识的凸现

过去的篆刻艺术研究或印学研究，基本是以个体为主的活动方式进行的。也有结社，但未见明确宗旨、社规。如“昔乾嘉盛时，则有丁龙泓、金冬心、厉樊榭结吟社于先，钱叔盖、李节胎、释莲衣立解社于后。”（《西泠印社成立启》）他们是印人、诗人或书画家结社的民间学术社团，但无鲜明宗旨、社约或相应的手续等保证，在当时虽有一定作用，但对后世的影响不大。而西泠印社在1904年成立时，不是为继承弘扬某家某派的印风，而是为弘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印文化，其研究对象不分地域，为各家各派印人的作品、印风与有关资料等，是以共同研究的群体意识的方式出现的。这在当时是创新的，是具有独立的品格的。

西泠印社几位创始人，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庵、吴石潜四位，当时他们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于篆刻艺术造诣来说，尚难称为大家；但他们对弘扬印学却有一股冲天的设想与干劲，他们意识到，要开创一番事业、要使弘扬印学的目标实现，就得要邀请更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入社，商量、筹划的结果是，不久便邀请海上已大名鼎鼎的吴昌硕加盟，并推举他为社长。在他领导下，在他威望的影响下，“修启立约，招揽同志”，有志者、有成者，先后纷纷入社，共同为实现“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印社宗旨而奋斗献身。

（二）独立的艺术观

过去，篆刻艺术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虽然这门艺术在中国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但一直是以实用为目的，元明之际文人参与，于篆刻的艺术地位略有提升，但仍是“雕虫小技”，或附属于诗、书、画之后的一种点缀手段。自西泠印社成立之日起，篆刻才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与书法、绘画、戏剧、音乐等姐妹艺术平起平坐。吴昌硕说：“书画既有社，印社之设，又曷可

少哉!?”(《西泠印社记》)因此,理所当然地,研究印学者要成立独立的西泠印社。鲁坚也明确表白:“西泠印社者,海内外印人研求印学之地也。”(《西泠印社记》)

一种思想观念要独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往往会遇到传统的习惯观念,或守旧的习惯势力,或某种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具体执行者的思想的片面,也会形成干扰。认识是在不断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修正的。可举两例为证:

金石与篆刻。印社成立之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两者是有区别,也是有联系的。“金石”是一个较为广泛的范围,包括金类的钟、鼎等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等,石类的历代碑碣等石刻文字及其拓片与发展历史等相关内容。而“印学”则只是金类中的春秋战国与两汉以后的玺印,与明清以降的印章为主要内容,兼及与之相关的文字类印谱的发展、形成等史论的研究。在印社成立之后,时有混淆而用的时候。印社成立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皆有“罗列金石家书画”陈列或“金石书画”展览,故当时与后来都有称印学家或篆刻家为“金石家”的。他们之中有兼通者,或为了尊称是可以的。但为了准确,绝不能混用。新中国建立后,在讨论会上,在文章中常见混乱之争。直到印社80周年大会上,沙孟海社长作了定释:“清朝时候,金石很吃香,印是金石的一部分。旧中国时,社会上瞧不起我们,认为篆刻是雕虫小技,因此我们称自己是金石家。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

金石、印学与书画。研究印学,要涉及金石学中的某些部分,为了印学研究的深入,有一定书画的修养也是很有好处的。在印社中这个关系很密切,但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就改变了印社宗旨的性质。少数社员偏重于某一方面,也是应当允许,且应鼓励的,但若想以一己之见,左右印社发展的方向,那就不对了。印社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某时某些不正常现象,偏离了原有宗旨。如“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就常被曲解。在雅集活动中,在印社的刊物上,在印社××周年社员作品集中,常常出现书画占主要场地与篇幅的情况。因此在多次理事会上有理事发表了意见。沙孟海社长也多次正面提出看法,在85周年大会前夕,“他对局领导和印社负责人就作了语重心长的指示,……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又说,“西泠印社与社会上一些团体不一样,是搞篆刻、金石、书画的,要以印为主,书画是附带的,而书画要与印有关……”。其实,早在90年前,首任社长吴昌硕在他的《西泠印社记》中,就已明确指出:“人以印集,社以地名。”作为印社,顾名思义,当然要以印为主。

(三) 别开生面的活动方式

过去印人的活动,多是附属于书画界,如上海题襟馆的金石书画会,或是少数人朋友家庭式的聚会。西泠印社成立后,独立的别开生面的活动方式,是定期的春秋两季的雅集。雅集不是一般聚会,有明确的目的和组织方式。内容是围绕“研究印学”这一主题,观摩各自收藏的古人印章、印谱或书画,或研讨今人篆刻的印章、印材、印学等。形式上看,这类似于一个展览会。从时间上看,是定期的,风雨无阻。在《西泠印社成立启》上有言:“吉金乐石,喜收藏者风雨摩挲,别类分门,共欣赏者云霞辉映。”《社约》上说:“本社以清初黄山诸家及西泠八逸为最备,同人各有所藏,兹合议于每年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以助眼福而助清兴”;“本社同人会集之日,各携所藏,相与传观,凡吉金乐石、法书名画、雕刻、匋冶图集、文玩皆属之”。既言“陈列社中”与“共同欣赏”,自然是研究活动。还可以延伸时间,变定期为活期,而且也对外面的参观者开放,俨然有似现在的印学展览会、印学图书馆,实是开篆刻独立展览之先河。

(四) 首开吸收外籍社员的先例

西泠印社的成立，震动了整个印坛，印人从此有了切磋交流的场所，国内外篆刻家纷纷入社。汉学家、日本印人河井仙郎、长尾甲也远渡重洋来到杭州，经吴昌硕等人介绍，加入了西泠印社。此事首开中国国内民间学术团体吸收外籍社员之先河。外籍社员参加印社，活动经常化，每年来华交流，他们回国后，河井在横滨仿效西泠印社，组织一批日本印人，成立了江上印社，推动了印学的组织发展。同时还不断促成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览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举办，扩大了西泠印社与中日印文化交流的影响。及至今天，外籍社员越来越多，已遍及日、韩、新、美等国。西泠印社及中国印文化的影响，越来越远。

（五）有一个精雅的社址

历史上曾有不少民间社团，它们活动一段时间后，随着几个创始人或骨干去世便自然解体。这些社团内部在经济上、人才上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虽有但一般化，不精雅别致，无特点，时过境迁，也一样被淘汰出历史。西泠印社若社址选在他处，也许不能存活到今天。

西泠印社社址，选择在湖上孤山一角。人倚楼饮茶、赏印、观谱，而后“于数峰阁旁买地数弓，遂议醵资营建立印社”。当时动机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但此选择妥当，以后经十数年之经营建构，成有依山傍筑的楼、阁、亭、馆、泉、塘分布，曲径通幽、山石叠翠、林木葱笼的富有江南特色的园林建筑群，并与中国印文化有机结合，盛得中外园林专家的首肯。即使经过战乱，或“改朝换代”，停止活动数年，因文化遗存、景物尚在，生命力依旧旺盛，一遇东风，立即迸发出浓强的活力，又开枝发芽，继续繁茂。

二 执著的印学研究精神

西泠印社的宗旨，开门见山地打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旗号。这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元以前的印人，多为手工艺人性质，刻刻实用的印章而已，那是所谓“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到了宋代，米芾提出了鉴藏印“细文细圈”（即细边）的审美要求。元代时，赵孟頫钩摹汉印，“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彷彿而见之矣”。而吾丘衍对印章的审美要求，较前人更有系统，他提出了包括字法、篆法、边格、朱文、白文、章法等《三十五举》，这是印学萌动时期。到了明代，不少印人写有精彩的印史、印论、技法方面的短篇，这是印学滥觞时期，但当时人们还未明确提出把印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而西泠印社创立时，却开宗明义提出“研究印学”这一宗旨，并且有目的、有计划地逐步努力着。

四位创始人当时是否有明确分工，无文字可考，但事实上确各有侧重。从他们的研究成果看：

叶为铭，在创社后曾先后撰有《广印人传》、《后续印人传》、《金石家传略》、《叶氏印谱存目》、《西泠印社志》、《歙县金石志》等，可见他偏重于印人传史与金石考据等方面。

吴石潜，专重于编辑出版印学研究基础资料的工作。先后编有《遯庵古印存》、《古陶存》、《古砖存》、《古泉存》、《印学丛书》等数十种书。

王福庵，著有《说文部首检异》、《麋研斋作篆通假》等，专精于印文字学方面的研究。

丁辅之，侧重于商卜文的研究，撰述有《商卜文集联》、《商卜文集存》、《鹤庐诗词》等。

他们四位创始人都擅长刻印，都出版有各人的专辑印谱，同时都编辑出版过古代或前辈名家印谱，为研究印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或名谱资料。

同时，印社其他社员也根据各人情况，一面对篆刻艺术创作积极探索，出版个人印谱，一

面编辑古今印谱,如汪录启将家藏古印编成《小飞鸿印谱》,黄宾虹编有《冰绉古印存》10卷,葛昌楹有《传朴堂藏印精华》12卷、《邓印存真》2卷,方介堪有《古玉印汇》等等,还有丁仁、高络园、葛昌楹等数人共同编纂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葛昌楹、胡淦合编《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等等,粗略统计,仅在新中国建立前出版的集古或自辑印谱,即在120部以上。

社员在印学研究著述方面也有积极表现,如钟裔申撰《篆刻约言》,王芻昆有《治印杂说》,汪厚昌有《说文引经汇考》,黄宾虹有《印说》,沙孟海有《印学概论》、《印学史》、《沙邨印话》等,罗福颐有《印谱考》、《汉印文字征》,马衡有《论刻印》,陈巨来有《安特精舍印话》,傅抱石有《摹印学》、《中国篆刻史述略》,潘天寿有《治印丛谈》,等等。

西泠印社社员,绝大多数都是印人,既要刻印,又要刻好,并逐步创造出个人风格,为此得掌握文字学、印史论以及诗文、书画、文史、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都是印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各人职业与工作关系,他们研究的内容各有所侧重,在印学著述方面也就有了不同表现。有的偏重于印史,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古文字学……结果是对印学研究各方面的深入或边缘交叉,进而从整体上收获了西泠印社印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建国以后的50年,这一学科还未定型,但已显现雏形。

从五年一次的社员大会中的学术交流研讨,可以看出学术空气的日见浓厚。西泠印社1963年60周年大会上,仅有沙孟海、罗赤子等三人提供了三篇论文。1984年80周年,论文集《印学论丛》收集有22篇论文(其中日籍社员两篇)。1993年90周年论文集注明“共收到论文40余篇”,后经审订收入《印学论谈》27篇(其中日本七篇)。1998年95周年,举办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收到论文106篇,选入论文集的有38篇(其中日本五篇、韩国两篇、法国一篇),涉及内容面也较广,有印学史论、印人研究、谱籍研究、创作研究、考证收藏、技法研究、篆刻教育等。

除此以外,社员根据各人专长,还出了不少印学专著。如钱君匋、叶丰合撰的《中国玺印源流》,傅抱石《齐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罗赤子《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罗福颐《汉印文字征》、《古玺印概论》,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简述》,沙孟海《印学史》,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叶一苇《篆刻丛谈》、《雕虫札记》、《篆刻史》,韩天衡编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天衡印谭》等,《钱君匋论气》,刘江《篆刻技法》、《篆刻美学》、《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篆刻形式美》,林乾良《印迷丛书》、《西泠群星》、《方寸万千》、《丁敬》等,陈振濂《大学篆刻创作》,韩天雍《日本篆刻艺术》,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徐畅《商玺研究》,徐银森《中国篆刻》,等等。还有1/2以上社员都出版了个人印谱。这些成果,不仅表现出印社对印学研究的重视、倡导,同时更体现了社员们对弘扬祖国传统的印文化的孜孜不倦、执着追求与敬业的献身精神。

四位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一生对印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可算老一辈的代表。他自幼承家学,喜蓄印,对书法篆、隶、楷、行无一不能,精研文字学。一生刻印20000余方,深得浙派神髓,更广收博采,发展了典雅隽秀工整一路风格,曾任北京国家印铸局技正,后至上海,鬻书、卖印以自给。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画院画师。生前曾整理编辑《福庵藏印》16卷、《麋研斋印存》24册,编撰有《说文部首检异》、《麋研斋作篆通假》等,可谓著作等身。他一生治学严谨,每治一印,对其篆文均详加考证。他常说,文字有假借不同,一定要弄明白而后篆。有时为说明字义,遍查各书,“晚身有病,起坐不便,然作书、刻印不止,经常卧于藤椅上刻印。傍晚,案上置白酒一杯,边饮边刻,日日如此”。(高式熊《当今印坛巨擘——王褫》)

三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英、美、德、法、日等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开口岸，划租界，强签不平等条约，不仅侵犯我领土主权，压榨我国民，同时也进行着疯狂的文化掠夺，强买盗运中国文物。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西北简牍、石刻造像、青铜玉器，到玺印古玩、书画典籍，无所不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泠印社创立，明确以“保存金石”为宗旨，体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创社之日起，印社成员无不怀着对祖国、对民族、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追求，各尽其力，不断收购玺印、碑刻、印谱、典籍等文物，捐献印社以为藏品；或携至印社，供同道社友交流观摩。最为典型的事件，莫若义卖筹款赎回汉三老碑。

1852年（清咸丰二年），在余姚客星山下出土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此刻石高三尺七吋，宽一尺七寸五分，出土时额略缺，然碑文217字完美无损。这是浙江出土的惟一东汉刻石。不仅具有文物价值，而且于书法艺术而言，也具有极高的价值。清李葆恂《三邕翠墨簪题跋》曰：“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是“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又“笔法已有汉隶体”。顾燮光《梦碧簪石言》赞：“书体浑穆，如椎划沙。”俞曲园《春在堂随笔》、方若雨《校碑随笔》、魏稼孙《绩雨堂题跋》等均加以著录。《余姚县志》誉之为“浙东第一石”。此石出土时，为当地名绅周清泉收藏。后周氏家宅毁于火，家道衰落。辛酉（1921年）秋，碑转徙至上海，为丹徒陈渭亭购得。“汉代石刻存世极罕”，当时即有外国人垂涎此石，欲以重金从陈氏手中购去，偷运出国。此事为浙人姚文敷、沈颢等得知，遂转告在沪浙人。西泠印社在沪社员吴昌硕、丁辅之等闻风而动，草拟募捐公启：“此碑文字，尤奇古完整，若任其转徙，或竟流于禹域之外，使后生学子不复得见汉人遗迹，岂非吾邦人士之耻耶？”启示遍传乡人，印社社员个人捐献书画、印谱等举办了金石书画义卖展。不旬月，先后有65人参加，筹得8000银元，将此碑赎回，择西泠印社隙地，建三老石室贮藏陈列，永久保护。吴昌硕还欣然撰《三老石室记》，以志此举始末。此事表现了浙人及西泠印社社员爱国、爱乡、爱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其地今日已被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青少年与新社员的一本活教材。

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其他还保存有汉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魏侯景明愷墓志铭，隋羊孝仁本、周萧遇和唐徐处士故朱夫人等墓志，以及元、明、清等墓石、买地券、建桥碑记等20多块。这些古代碑志大多为印社筹集资金所购得，置于印社碑廊贮藏，建国后，有的碑志已转有关方面保存陈列。

除石刻、砖瓦之属外，尚有少数青铜玺印，以及部分金与石文的拓片和较多的手拓印谱，多为社员所捐献。包括吴云《二百兰亭斋古印考略》、吴隐《遯庵古铜印谱》、丁仁《杭群印辑》、叶铭《周秦古玺印谱》等30多部，存于社中供借阅参考。可惜抗战期间，敌寇侵杭，众多金石文物与印谱图籍皆已散失。

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年老社员也陆续捐献了一些玺印、印谱、典籍与印社，爱国爱社思想绵延不断。每逢国家有灾难，社员总是慷慨解囊，捐书画印以义卖。如1991年夏秋之际，为支援灾区抗洪救灾，印社两次举办在杭社员书画赈灾义卖。之后长江抗洪，也有如是义举。捐款数虽不是很多，但也表明社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印社的爱国爱社传统。

四 爱社如家的奉献精神

自西泠印社创立之日起,所有从业人员皆对印社事务各有承担,各尽义务,而不取任何报酬,甚至“举舍于社而不私”。这种精神,我们归纳而言,是爱社如家的奉献精神。其主要表现:

(一) 聚资买地建房兴社

在创始阶段,社员们,尤其是几位创始人,是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力出力,共同筹划兴社。“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于数峰阁旁买地数弓,遂议募资营建立印社。”(《西泠印社志稿》卷三)以后数年,直至1913年正式宣告成立时,靠不断募集资金与社员、社友的举囊相助,逐步扩大面积到五亩陆分柒厘捌毫,先后建成了山川雨露图书室、石交亭、宝印山房、斯文奥、四照阁、心心室、剔藓亭、印泉等房舍与景观。

印社成立后,房舍、景观仍在继续不断地新建,或接受捐赠,使印社社址不断扩大,一片兴旺景象。如吴兴张钧衡捐资建闲泉,湘阴李庸奉父命捐献小盘谷(室名),1914年又兴建山顶之题襟馆,1915年吴隐“斥私财建遯庵、潜泉,举舍于社而不私”。1919年社友吴善庆捐建还朴精舍、鉴亭,1920年吴善庆捐献观乐楼,丁仁得石捐造丁敬立像于三老石室旁。吴熊舍资敬造弘一写经的阿弥陀佛经石幢,1924年有吴兴张钧衡捐建凉堂,丁仁捐凿邓石如大石雕立像于小龙泓洞前,等等,以后又不断补修或重建原有破损的柏堂、竹阁、福连精舍、鸿雪径、缶龕、华严经塔、三老石室等,使印社范围内楼、台、亭、馆依山参差而置,秩序井然,园林建设,益趋完美。

在建房馆景园中,社长、社员、社友同心协力,精心策划,叶铭主持施建,他表弟土木建筑工程师吴寅社员参与设计、制图、督促施工,使房舍与园林紧密结合,俨若天成,深得后人赞赏。园林专家陈从周赞曰:“当为湖上园林之冠。……社之景以阁为主,全国环此而筑,远眺近观,俯仰得之,耐人寻思。造园有天然景观,有人文景观,两者兼而有者,湖上惟此而已,所谓高度文化之景区也,宜其永留不朽也。”现社址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二) 捐献金石、书画、图籍

社员无偿捐献玺印、书画、拓片、书籍等时有不断。民国时期社员捐献的书,据《西泠印社志稿》“藏书”一栏记载,有《六书系韵》、《说文问答疏证》、《金石史》、《金石古文》、《金石略》、《印人传》、《续印人传》、《广印人传》、《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17部(种),另有《二百兰亭古印考略》、《周秦古玺印谱》、《遯庵古铜印谱》、《西泠八家印谱》、《龙泓山人印谱》、《种榆仙馆印谱》、《二金蜨堂印谱》、《缶庐印谱》等精拓本印谱24部。这些印谱,均为当时社员手拓自藏原印编辑而成,捐献印社长期保存,以供“同好到社索阅,藉获观摩之益”。可惜战时多已散失,至为可惜。

其他金石之类,如宋淳熙四年之石井栏与刻字,又宋嘉熙元年石井栏铭刻,为丁辅之家祖传物,后由丁氏捐献与社。清梁同书书《六一泉三堂祠记》等乃“社员购得藏于社中”。有的则为社员于废墟中觅得,而后置于社中保存,如明古长生庵碑记、清宝光庵纪石、宋建雷峰塔西关残砖、南宋筑涌金门城砖等。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社员为弘扬印学,兼虑其学于家后继无人,恐有散失,故多捐献与印社。1957年印社欲建吴昌硕纪念室,其后人吴东迈闻之,主动无偿捐献有关书画、篆刻作品及画笔、画案、坐椅等共数十件。20世纪60年代,其孙吴长邺又捐献缶翁常用印、田黄石章及其

他书画、文物数十件。

1962年张鲁庵家属叶宝琴女士遵其丈夫遗愿，将他毕生珍藏的明清原拓印谱493部（其中不少为海内外孤本）及战国至两汉古玺印与明清名家刻印1500余方捐献印社。为纪念其义举，特辟望云草堂（张先生斋名）珍藏。

其后又有高络园先生捐献古铜印500方（《乐只室古玺印存》原印），晋铜鼓两只，汉、晋纪年砖300余块。同时其女高壁女士捐赠陪嫁品八大山人册页20帧。继之不久又有葛书征献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精粹无比。其中如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鹈深处”、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印，均为世人所重，为国家一级文物。1964年王福庵家属遵先生遗志，将他遗印356方捐赠印社。1979年，历经“文革”，“大难不死”，王个簃效法先辈精神，将“文革”后发还的家藏书画珍品——八大山人和吴昌硕等大家书画、《缶庐诗稿》手迹等30余件，无偿捐献印社。另有陈叔通捐献玺印文物等42件，钱镜棠捐文物27件，吴振平捐印29方，张宗祥、沈尹默家属捐献他们的手迹各百余件……。

各人捐献物有多少，但其以社为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则一，可赞也。

（三）为筹建印博而捐献

西泠印社有丰富的秦汉玺印与明清各流派的代表作藏品，但多年来只能深居库房，而不能展示给广大印学爱好者、篆刻家欣赏与研究，实为美中不足。早在1986年理事会上，我曾提议建一印学博物馆，以展示有关藏品，给印社开辟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窗口，于印社、于社会、于爱好者和游人都是大有好处的事。众多理事一致赞同，望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次年印社中的市政协常委李伏雨，还将此建议以提案方式通过政协交给杭州市政府。但终因土地、资金、馆舍无法落实而延搁。印社90周年庆典后，此建议经新任社长赵朴初的努力，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并拨发部分启动资金。1995年正式立项，列为杭州市文化建设重点项目之一；1997年奠基；1999年国庆前夕耸立在印社西麓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开馆，对外开放。

在筹建过程中，许多社员与社外印学爱好者，都主动积极捐献印学实物与资料，以丰富中国首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印学博物馆。

1998至1999年间，印社理事杨鲁安率先将毕生精力所聚、珍藏多年的印学实物资料210余件（部）慷慨捐与印社博物馆。其中有战国至秦、汉、宋、元官私玺印135方；各种文字古钱币、汉铜镜、青铜器、甲骨文片、汉砖瓦、封泥，以及印谱、青铜器铭文蜕片六册，计190余张，其中有散氏盘、毛公鼎等的拓本，上有阮文、翁文纲等人的题识，十分珍贵。

不久由梁章凯牵头，相继又有日籍理事小林斗庵捐献齐国古陶文50品，社员中岛兰川捐藏传铁印50品，菅原石庐捐赠郢城古陶文50件，北京名画家范曾捐献宋元古印50品。

其他还有理事童衍方知印材馆缺贝质印材，即主动将自家珍藏多年的贝质刻印捐赠；梁章凯、杨广泰、刘江、林乾良、方广强、陈东之、孙家潭、林近及日人松仓晴海、今成清泉等人捐赠有关陶印、陶拍与其他稀少印材、印章等。

这些捐赠品，不仅充实了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填补了展品的空缺点，丰富了印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同时也表明西泠印社前辈们以社为家、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五 团结奋进的精神

西泠印社从创立之日起，日渐兴盛，百年不衰，究其原因，是社员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精诚团结、敬业奋进的可贵精神。全社上下都是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而聚集在一起，为

了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印文化而同心协力、不断奋进。团结的力量是无敌的，奋进则可创造辉煌的业绩。这主要表现在：

（一）不同流派的合力

在《西泠印社成立启》中已点出，“社以地名，人因印集”。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更明确指出：“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在胡宗成的《西泠印社记》中阐述得更为清楚：“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古索今，开后启之先声。”虽然当时的创始人或社员，因受西泠八家印派影响，基本是浙派一路，但他们不以自囿，而是放眼全国，认为对不同地域、不同流派印都应传承与弘扬。故在1905年开始建立的仰贤亭，将历史上有成就的各派印人有画像可考者28人画像均列入其中，“勒之贞石，嵌奉印社仰贤亭，以垂永久。灿光芒于列宿，切仰止于高山”。28贤人中，杭郡西泠派有丁敬、蒋仁、黄易等12人，隶属浙省籍的有赵之谦、徐三庚等五人。而外有13人，如山东高凤翰、桂馥，安徽巴慰祖、邓石如，江苏板桥道人等。这说明西泠印社建社标准是五湖四海的，是以印学上有成为主要依据的。

在以后吸收社员，也是以印学成就与愿为弘扬中国印学出力为前提的。现在印社社员国内遍及26个省市自治区，近300人；海外涉及日、韩、新、美、加等国。

（二）国外社员友诚相待

清末民初时，印社已吸收两名日本籍社员，一名河井仙郎，一名长尾甲。他们两人与吴昌硕及四位创始人交往密切，情谊颇深。

河井仙郎（1871—1945），日本京都人。在入西泠印社前七年的1897年就开始与吴昌硕有书信交往，河井崇敬缶翁，将印作远寄上海求教。缶翁长信复之，深加激赏。河井见信兴奋异常，当即回函：“先生与仆未有半面之识，而眷爱之厚，既业如此，一读再读，感极潸然泪下。先生更见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汉，古朴苍然，妙不可言。高谊之贶，铭肝不知所谢，当子子孙孙永宝焉。”又说：“仆一游贵国，叩大门以请清诲者有年矣……”两年后河井来上海，由罗振玉、汪康年介绍，“叩大门而请清诲”，一遂宿愿，入缶翁门研习印学。不久后回国。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河井言：“余闻而神往之，未暇往观也。”次年“春游吴下，道出武林，乃得与吴、叶、丁、王诸君把晤于印社，以抒积愫、评论印学，迨无虚日，又各出所藏印命余鉴赏。其中苍劲古秀，典雅工整，人不一家，篆不一体，博而且精，目不暇给……，诸君又能椎摹精拓，编辑印谱，不肯自秘，以提倡后学，即余身处海外，亦得一苇而至，见所未见，是不特余之幸，亦为后世刻印者之幸。”（《西泠印社记》）从此中可见彼此交往之深。河井随即加入西泠印社。自此，河井几乎年年来华，直至1931年由其弟子西川宁陪同作中华最后一游。他与缶翁等均有诗作交流。吴曾有《临权量铭》及《赵悲庵书无款署为瓮庐赋》持赠。后者题：“悲庵好绩安吴笔，饱墨铺毫意崭新。守缺抱残吾辈事，车工著述又何人。”

长尾甲（1864—1942），日本高松人。与吴昌硕兼有师友之谊，是汉学家，1903年辞去东京高师教授职来沪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在华十数年，与缶翁结邻三载多，两人情谊颇深。缶翁曾在《为东友画双鹤》中记其事，称“交颈如鸳鸯”，“双宿双飞不暂离”。长尾1914年世界大战起回国，仍唱和不辍。

现有国外社员中，日本先后入社的有小林斗庵、梅舒适等13人，韩国有金胥显、权昌伦等三人，新加坡有赖瑞龙等两人。他们与印社先后举办在各自国家的交流展、演讲等活动，对弘扬印学、增进国际友好，做了不少工作。

（三）国内社员的团结关爱

印社内不少人是吴昌硕的学生，如潘天寿、诸乐三、王个簃、沙孟海等。他们之间既有师生，又有社员之间的关系，关爱之情更为明显。

潘天寿 27 岁去上海，后任教上海美专。诸闻韵、诸乐三兄弟把他引荐给了吴昌硕。谈诗论画间，吴昌硕见其颇有才气，第二天特书“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头总入诗”的对联赠潘。后不久潘又送去一幅粗笔山水请教，缶翁当时也鼓励几句，当晚又写一长古，第二天请闻韵带去给潘。诗中内容，戒勉重于褒奖，诗中前有“……寿何状兮欣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最后有“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潘听其忠告，加强了基础方面的功夫，后来成为近代著名大家，诗书画印均有个人特殊风貌。

王个簃居缶翁身旁四年多，朝夕相处，学艺、教孙两不误，缶翁去世，有《哭缶师》：“公爱我甚为可教，善诱循循期深造。公今一病遽长眠，师恩无量将何报？……”

印社创始人都非常注重团结同仁、关怀后辈，促进印学成长。如高式熊称王福庵对其“初学篆刻，谆谆教导，不厌其烦。他常说文字有假借不同，一定要弄明白而后篆。有时为说明字义，遍查各书出示。如‘寥廓’，《说文》作‘寥郭’，‘攷’、‘好’二字不相同，等等”。又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福老让我用西泠印社斋、馆、阁名称刻成印谱，他亲自撰写边跋。每印印样均请福老指点修改。他极为认真，一一批改妥贴。不久，闻韩登安先生亦刻成相同内容的印谱，福老便嘱我们的印谱暂缓问世。其心地忠厚，令人钦服”。另“1948 年张鲁庵、秦康祥发起，篆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四册，每人一印，款刻小传，张供印石、纸，秦采访编写，我负责篆刻。此举得到福老首肯，并对每印稿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共计 220 余方，成为了解、研究印社社史的珍贵史料”。（高式熊《当今印坛巨擘——印社创始人之一王褫》）

西泠印社百年来，不仅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随着时间的磨炼，也造就了一支研究印学的强劲的队伍。而以上所举五方面的思想与精神的表现，则是百年来广大社员、尤其是创业时代的先辈们打下的基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自豪的。我们后辈们更应高举西泠印社宗旨旗帜，弘扬西泠印社精神，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2003 年 6 月于杭州南山